

从容闳和珠海简议近代中国留学文化特色^{*}

刘学照

(徐州师范大学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江苏 徐州 221009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062)

[关键词] 容闳; 珠海; 中国留学文化

[摘要] 近代中国留学教育肇始于容闳所倡导的留美幼童的派遣, 其后派遣学生留欧, 至清末又出现留学日本潮。容闳的故乡今珠海地区是中国留学教育的主要发祥地, 它对中国留学教育文化的发展贡献殊多。近代中国是一个不断遭到列强侵略的国家, 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整合在面向世界、学习西方的同时, 一直怀有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诉求。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作为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和突出表征, 始终显现出开放性和民族性兼具的特色。而容闳和被称为“容闳的‘美国人’”留美幼童们, 他们回国后输入“西洋之学术”, “介绍西方科技到中国”, 为“中国追求现代化”和“复兴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实际是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所具特色的人格化的表现。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08)05-0001-07

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内涵和必要动力。容闳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之父, 珠海是中国留学教育的重要发祥地。将容闳和珠海相关留学人士的思想和业绩作为考察留学文化的一个学术窗口, 当有助于窥视近代以来中国留学文化所赋有的开放性和民族性兼具的特色, 从而显现中国留学文化研究的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开放性: 面向世界

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汇的产物。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 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和与之相应的国际关系格局, 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某种一体化的趋势。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 在人类文明史上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自明清以降, 由于封建专制政治腐败和文化观念茫昧保守, 中国渐渐落后于世界历史行程。早在鸦片战争时期, 官员和士人中的有识之士就深刻批评清廷上下“无人留心海外”, “徒知侈张中华, 未睹瀛环之大”的“茫昧”现象^{[1] P530 [2] P499}。迨至鸦片战争失败, 中国被迫在屈辱和依附的状态下五口通商, 踏上近

代化历程。但战争结束后, 清政府“雨过忘雷”, “二十余载, 事局如故”^{[3] P29 [4]}。只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更惨痛的失败, 清政府才采取一些政策性的变动, 开展了“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发生后, 清政府于19世纪60年代为培养“洋务”人才, 先后创办了同文馆、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批洋务学堂, 后又采纳容闳提议, 决定派遣幼童赴美留学。1871年, 在美国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另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沪局”, 作为挑选学生并施以训练的“预备学校”。于1872至1875年每年派20名幼童, 分四批赴美留学, 预定“每批幼童驻洋15年”, “通计首尾20年”, 用以作为“采西学”的进一步举措, “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 然后可以渐图自强”^{[5] P153-163}。显然, 留美幼童的派遣是中国人有组织地走出国门吸取西方科学和文化的“破冰之旅”。它作为一种政府行为, 在鸦片战争打开国门30多年后终于出现, 实是对朝廷上下曾经严重存在的茫昧虚骄的文化保守观念的重要突破。另外, 留美幼童的派遣也标志着作为一种跨国教育的中国留学教育的肇始。它的兴起与一批洋务学堂的举办, 如同在中国传统教育结构

[收稿日期] 2008-05-13

[作者简介] 刘学照(1935—), 男, 江苏建湖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徐州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此文为2008年5月珠海中国留学文化研讨会的会议论文, 曾在会上宣读。

中打入了两根楔子,逐渐使中国传统教育结构和文化结构发生蜕变,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新式教育和留学文化的前驱先路。

容闳所开创的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走向世界、学习西方的开放性特征。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广东省香山县(含今中山、珠海和澳门)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濒临南海的香山县,从明季葡萄牙进入和租占澳门以来,就是西人东来中国和中国人接触西方、吸取西洋文化的前沿阵地。近代香山及其附近的穗、港等粤海地区,得“西学东渐”的风气之先,中西文化首先在这里接触和交融。容闳自幼出身贫寒,1841年到澳门马礼逊学堂读书,接受“半日中文,半日英文”的习西学又兼及中学的教育。1842年,学堂迁到香港。1847年,他与同学黄胜、黄宽一起随校长布朗夫妇赴美国学习,进入马萨诸塞州芒松学校读书。第二年秋,黄胜因病回国,其余二人于1849年完成学业,黄宽于1850年转赴英国学医,容闳则考入耶鲁大学,于185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成为首位“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中国人。容闳欣以为是“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的受益者,他于1854年回国,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6] P61.39-40.62}。正如容闳的学生后来评价容闳说:“他一生的宏愿就是促成出洋局成立,派遣一些学生出洋留学,学成后为祖国服务,以迎接千变万化的世界形势”^{[7] P4}。容闳经过长期的奔走和努力,藉洋务运动兴起之机,在曾国藩、李鸿章以及丁日昌等洋务大员的支持下,终于使自己的创议得以实施。在实现四批幼童赴美后,容闳深信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特开新纪元”的创举,对自己“教育计划告成,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感到无比喜悦,认为“将来世界成为一家,不可谓非由此滥觞”^{[6] P49}。显然,富有世界眼光的容闳,始终把他开创的留美教育看作是中国人决心走向世界学习西方的伟大开端。

先驱者的历史脚步会对后来人起指引和鼓舞作用。容闳倡导的派遣留美计划因清政府内部保守势力作梗于1881年7月猝然中止,借口“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遂决定将“幼童出洋肄业局”^{[8] P165}撤销,结果所派学生绝大部分未完成学业就被分三批撤回。虽然如此,但走向世界、学习西方是中国求富

求强的必由之路;中途或有曲折,最终不可阻挡。

19世纪70年代中期,得容闳倡导赴美留学的启迪,加之受日本发动侵台战争的刺激,在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以及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清政府于1877年派出首批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分别赴英国和法国学习驾驶和制造;至1881、1886年,又派出第二、第三批,前后共派出留欧学生88人^{[9] P639-640}。他们后来大多成为北洋海军指挥、驾驶和各项相关技术的骨干力量,而且其中还涌现出像严复这样杰出的翻译家和维新思想家。

甲午中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而中国留学运动的再起并迅猛发展成为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表征。甲午战后、特别是20世纪初,一方面,中国留学欧美的潮流在持续,如,1896、1897年又派出第四批福建船政留欧学生46人^{[10] P93};另外,中国留美学生也逐渐增多:1900年10多人;1905年30多人;1910年增至500多人^{[9] P738}。对此,时届耄耋之年的容闳十分感慨:“自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国学生陆续至美留学者,已达数百人。是1870年曾文正所植桃李,虽经蹂躏,不啻阅25年而枯株复生也。”^{[6] P145}他对自己花毕生精力培育起来的留美教育得以复苏并有新发展感到无比欣慰。另一方面,其时又出现了留学日本和翻译日文西学书籍的新潮。俗称“吃一堑,长一智”。通过甲午战争,中国人总结了“不察邻国,误轻小邦”^{[11] P223-224}的教训,对日本普遍投以钦羡的目光,深感“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极有成效,主张“中华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11] P213.250}。又认为,日本路近费省,东文易通晓,“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12]。强调中国“苟要图存”,“苟求实学,则不如假途于日”^{[13] P151},从而把东邻日本看成是中国吸取西学的“桥梁”和“捷径”。总计自1896年至1911年间,中国留日公费自费生不下2万人^{[14] P109},在规模上远超过留学欧美学生。另据统计,1901至1904年间,中国译西学书籍533种,其中321种即约60%是“从日本重译过来的”^{[15] P283}。可以说,20世纪初,特别是日俄战争后,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中国留学文化领域出现一种“假途于日”,“通过日本学西洋文化”的新景观。当时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吸取西学,谈“维新”、谈“革命”的重要场所。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其成员的大多数是留学日本学生,他们对共和革命和民国肇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珠海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重要发源地。容

阔和他的同学兼同乡黄胜、黄宽开拓了中国人留学美国之路。黄胜(1827~1902),字平甫。他去美国学习一年回国后,一直在香港等地从事西学传播工作。1849年,他应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所聘,任伦敦会所属香港英华书院印刷局监督。该局在1853至1856年间办有新闻杂志《遐迩贯珍》,其撰稿、翻译、总务等实际事务多由黄胜负责。该刊内容广泛,还介绍英、美政治制度和西国通商史,共出33期,远销内地各省^{[16] P45}。1861年,伍廷芳主持近代中国人第一份自办中文报刊《中外新报》,与黄胜共同负责。1861年,黄胜又担任《德臣西报》经理兼编辑。1862年秋,王韬由沪来港,佐理雅各译《尚书》,黄胜与他结交。后黄胜应洋务官员丁日昌之约,译著《火器略说》,经王韬增润成书,影响很广,流传至日本、越南^{[17] P24}。1864年10月至1867年3月,黄胜接替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任上海广方言馆英文教习,造就了包括曾任广方言馆英文教习和驻日使臣汪凤藻在内的精通西学人才多人^{[16] P340-343}。1871年,黄胜与王韬等合购伦敦会印刷局成立中华印务局,由他主持局务,承印中西文活字版书籍,成为中国人最早办的近代印刷企业,对近代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贡献很大。如一时影响很大的《循环日报》自王韬1874年创刊后,即由该局承印,并长期得到黄胜的支持和帮助^{[17] P168-169, 172}。1872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二份中文日报《华字日报》创刊,黄胜也是主笔之一。1873年,黄胜亲自将北京西法印书局向英华书院订购的两副大小铅字送到北京,支持京师新式出版事业,旋就道任第二批留美幼童领队,带领唐国安、蔡廷干等20名学生,踏上他已阔别20多年的美国国土。几年后,转任驻华盛顿公使馆翻译官^{[18] P236-237}。可以说,在以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黄胜声名不显,但实际上他自美返国后的几十年间,在“采西学”方面做了许多实事,他也是开拓中国留学教育和开创中国留学文化的先驱性人物。

至于黄宽(1829~1878),他1850年转赴英国留学后,又成为一位近代最早留学英国和欧洲的中国人,比清政府正式派遣留英留法学生早27年。黄宽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医5年,又在医院实习2年,获博士学位。1857年回国,终身服务于西医学,先后任广州仁济医局、博济医院医师,又兼任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校教学,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外科学等课程。黄宽品行纯笃,擅长外科,医术精湛,受到普遍好评。博济医院于1859

年成立,院长为美国教士医生嘉约翰。院长做手术时,多由黄宽协助或主刀。他们二人合作,共同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西医师,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17] P247-248 [18] P238-241}。黄宽1878年10月12日因病去世,他是近代中国吸取西医文化的先驱。

另外,珠海学人也参与近代中国留学日本之路的开拓。近代中国留学日本始于1896年6月15日,清政府派遣唐宝锷、戢翼翬、胡宗瀛、金维新等13人首批留日。其中唐宝锷,即今珠海人。这批留日学生由总理衙门从上海、苏州一带选派,赴日后由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照管,专为他们设立预备学校,1899年结束。三年间,先后退学6人,共有7人毕业。其中唐、胡、戢3人升入专门学校。唐宝锷从专门学校毕业后,又升入早稻田大学攻读,1905年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是最早在日本高等学校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的两名中国人之一^{[10] P96-97 [17] P244}。

唐宝锷(1878~1953),字秀峰。在他日留学期间,翻译日文西书之风很盛。1900年,东京留日学生成立第一个译书机构译书汇编社,所出版《译书汇编》杂志是留日学生最早的进步刊物,主要成员有戢翼翬等。他们将日文书籍译出,先在该杂志上连载,然后出单行本。唐宝锷所译《日本警察法令提要》也是这样出版的。另外,唐宝锷与戢翼翬合著有《东语正规》一书,这是中国首部日汉词典,它一版再版,对留学生学习日语帮助很大。唐1905年回国,从事政法工作。1911年曾为清政府起草陆军刑法。1919年,南北举行和会,唐宝锷任南方军政府代表唐绍仪的秘书长。后任国会议员。1925年退出政坛,在京、津地区从事律师工作,曾被全国律师代表大会选为会长^{[16] P42 [18] P48}。唐宝锷是中国人“假途于日”,通过日本吸取西洋法律文化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有关于日本法律方面的著作和译著近20种,对于清季和民初的法制建设卓有贡献。再之,受到清季留日大潮洗刷的革命诗僧苏曼殊(1884~1918),也是一位珠海学人。他短暂的一生充满跌宕、传奇色彩。曾入世革命,又出世为僧。时而昂扬奔放,时而郁闷低吟。他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他亦僧亦俗,在诗歌、小说以及译作中,洋溢着浪漫主义呼唤人性尊严的高尚情怀,蜚声中日,饮誉文坛。他是一位身受“假途于日”,“通过日本学西洋文化”大潮熏陶,交融中、日、西文化于一身的一位“奇才”。

由上可见,近代中国留学教育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留美幼童的派遣。至清末,先后出现过留美、留欧、留日几股潮流。而在近代历次留学潮中,容闳的故乡今珠海地区贡献殊多,先后涌现了许多引领风气的先驱性人物,他们与粤东和全国明学之士一起,抱世界眼光,怀爱国衷情,不断地拓展容闳所开创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改良中国文化之路。这就表明,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历程或有起伏,但面向世界,学习西方,坚持开放性,始终是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的首要特色。

民族性:复兴中国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间,不断遭受列强侵略和民族屈辱,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与变革始终包含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现代化的双重性历史课题。为此,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与整合在坚持学习西方的同时,一直怀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诉求。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作为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和突出表征,更显现出开放性和民族性兼具的特色。

容闳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的开创者,也是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先驱。他于185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即将归国之际,即树立“复兴中国”之志。他回国后,一直从实施其“教育计划”和“改良政治”两个方面进行。早在1860年秋冬,他为探求“造新中国”之路访问“天京”,向洪仁玕提出“为中国福”的“七事”,这实是一份中国最早的近代化蓝图^{[19] P225},其中关于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和设立各种职业学校等主张,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份教育改革方案。迨愿望落空,他便投身洋务运动,把自己倡导的派遣幼童留美的“教育计划”,“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6] P135}。这项计划后虽因被中止折损了成效,但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选送幼童留美学习”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肇兴的“划时代的创举”,对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记载,120名留美幼童除因故先回及在洋病故和未回的26名外,其余94名学生分三批于1882年抵国,“头批学生21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有船政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20] P167}。后来,他们在长期的历练和进取

中,逐步成为各方面的杰出人才。如电报输入中国,是李鸿章和洋务运动的一大建树。至甲午战争前后,电报总局的管理核心人才,多来自被分发到“北洋电报学堂”的留美幼童。分发学传电报的20名幼童除另有派用者以外,大多终身在电报局服务。程大业曾被派往满洲里任局长,负责建立北京与外蒙古的电报线。周万鹏1911年出任全国电报局长,袁长坤曾任邮传部电政负责人。陶廷赓献身中国电报业48年,最后从湖北电报局长任上离职。留美幼童在使中国政府依靠自身力量管理经营现代化的通讯事业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1] P99-101}。留美幼童回国后有吴仰曾、邝荣光、陈荣贵、陆锡贵、唐国安、梁普照、邝景扬等七人派往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后来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后经李鸿章安排,再赴英国伦敦学矿冶,回国后历任热河银矿总工程师、开平矿务局副局长及主任验矿师,为中国工矿技术奉献终身。邝荣光任河北临城煤矿总工程师22年,1909年,他勘查了沈阳附近的本溪湖煤矿,才有尔后的开采。这批服务于矿冶业的留美幼童,“他们开发了东自东北地区,西到甘肃各省的宝藏”,“为中国矿业做出了相当的贡献”^{[21] P107-109}。

在铁路方面服务的留美幼童,都是从海军和其他政府企业部门转来的,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迅速发挥才能。如詹天佑,早年在海军服务,后全身心投入铁路建设,“完成一条重要的铁路——京张铁路”,“国人念念不忘”,“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铁路专家”。另外,梁如浩、钟文耀、黄仲良、罗国瑞、沈嘉树、林沛泉、唐致尧、吴焕荣、周传谏等人,都在铁路界担任过要职。当时,清廷权臣巨卿在铁路、电报、矿冶及其他新兴企业中高据官位,而实际经营大计全靠这批留美幼童担挑。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要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21] P117-120}。

再者,有些幼童获有际遇,从进入要员幕府步入政坛。如梁如浩、蔡绍基、唐绍仪、吴仲贤、林沛泉、周寿臣,均曾随李鸿章的德国顾问穆德麟去朝鲜,协助建立海关制度,后又随袁世凯办理朝鲜通商事务,遂逐步在内政和外交方面获得高位。梁诚回国后考上总理衙门章京。1902年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1903年获美国安赫斯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10至1912年任驻德国公使,后又任粤汉铁路(广东段)总办。梁诚在出使美国期间,正有将美国多余庚子赔款移作

为中国留美学生培养用费之议，经他多次交涉和美国相关人士推动，到1908年，美国政府通过了把庚子赔款余款用作中国办学和培养派遣学生留美方案。接着才有清华学堂的设立。刘玉麟、欧阳庚也长期任驻外使领官员。刘1910至1914年任驻英公使，欧阳1928年从驻智利公使上离任。梁敦彦1884年起任两广、湖广总督张之洞英文秘书，1904年在汉阳、天津任海关道。1911年任外务部尚书，获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梁敦彦在天津任上，努力整顿“北洋大学”，并且鼓励该校学生赴美留学。他在外务部尚书任内，完成了与美国公使柔克义就退还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留美的谈判达成协议^{[21] P128-133, 149-150}。应该肯定，梁敦彦和梁诚对促成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重要举措出了力，他们和唐国安对创办清华学堂也作出了贡献。显然，许多返国幼童“富有交涉才干，而清廷倚重留美幼童来解决困局”。他们在内政、外交方面担任要职后，“给中国官场输进了新血”，“绝大多数，在中国现代化蜕变中，都作了相当贡献”^{[21] P136, 43}。

还有一件事是永载史册的，即留美幼童先后有40多人在海军中服务并担任要职，许多人英勇地参加了历次海战，其中薛有福、杨兆南、黄季良、邝咏钟、沈寿昌、陈金揆、黄祖莲七人，在中法和中日战争中壮烈捐躯，“为保卫中国之海疆”，“为促成一个现代中国的出现”作出了贡献^{[21] P75, 76, 80}。

容闳故乡香山县是留美幼童的主要生源地。所派120名幼童中，香山籍39人，占广东全省83人的近一半，占全国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在这39名中，16名属今中山，23名属今珠海。珠海留美幼童回国后的业绩，有的前已言及，下面再作些补述，用以进一步说明留美幼童在追求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蔡绍基、唐国安都做过外事工作，但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在创办高等教育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蔡早期在上海海关任译员，后随袁世凯赴朝鲜办理通商事务。1903年任北洋洋务总办，职掌直隶外事事务。次年出任北洋大学校长。1907年后先后任牛庄海关道、天津海关道，曾继梁如浩去辽南向日本谈判交还辽东半岛事宜，“为维护中国利益事，政绩特优”。1910年后，致力慈善事业并协助扩充北洋大学。他“在天津颇有政声”，1933年在天津逝世，天津英租界下半旗志哀^{[21] P34, 123, 135}。唐国安早先在开平煤矿、京奉铁路供职，后入外务部，参与就“庚款办学”问题谈

判的筹画，倡议“选送学生赴美留学”，旋任“清华学堂”副监督、正监督。经他提议，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当学校按他计划扩大时，他于次年8月病逝于任上。他的建议与工作，无疑是当年容闳“教育计划”的继续^{[18] P242-243, [21] P109}。

唐元湛和梁如浩，一位在电报扬名，一位由铁路界显身。唐回国后长期服务于电报界，曾任上海电报局长，1907年任邮传部左侍郎。梁早年赴朝鲜任穆德麟随员，做驻朝鲜通商事务大臣袁世凯幕僚。后历任北宁铁路总办、奉锦山海关道兼关内铁路总办，主持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关内铁路”（北京至山海关）。先后任牛庄、天津和上海的海关道。官至外务部右丞和邮传部副大臣。1912年民国建立，一度任外交总长。1921年出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1922年，与英交涉收回威海卫租界地。晚年，任华洋义赈会会长。一般认为，留美幼童返国后“成为铁路人才”，“对中国现代化”贡献最大的除詹天佑外，当数梁如浩最著名。他曾是铁路界巨头。有四子二女，两子留英，后均在天津成为名医。两子留美，一位也是医生，一位是艺术家^{[21] P134 P18] P244-245}。可以说，梁家在吸取西学方面颇有家风。

徐振鹏和蔡廷干长期任职海军，并致高位。徐回国后入福州船政学堂，甲午海战中任“定远”舰枪炮长，后随载洵出国考察欧美海军。1912年任第二舰队司令、练习舰队司令。1918年任海军次长，1924年一度代理海军总长^{[22] P342}。而蔡回国后，先后在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雷学堂任职。甲午海战中指挥鱼雷艇作战。1911年任海军军制司司长。1917年任税务学校校长。1921年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26年7月署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兼关税会议全权代表，10月，授海军上将。不久去职引退。晚年力研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清华、燕京等大学授课，著有《老解老》阐述古代经典对“君子”观念的涵义；《唐诗英韵》将120首唐、宋诗译成英文^{[21] P78-79 [18] P431}，表现了从政府大员向国学学者的回归。

容耀垣是留美幼童中唯一“与辛亥革命关系密切者”。容耀垣，又名容开，号星桥。容闳族弟，第三批留美幼童。返国初入天津水师学堂，后去香港经商。1895年参加兴中会。1900年，得孙中山书示，参加武汉唐才常自立军活动。失败后，经日本返港，再入商界。担任《中国日报》印刷事务总理。1905年，转为同盟会员。武昌起义爆发

后,曾去南京参与民国政府建立。后再返港,经营航运业,对孙中山坚持革命斗争颇多支持^{[23] 168-72, [21] 140-141}。

唐绍仪在幼童中名位最显。他“留美期间,成绩名列前茅”。中法战争前后,在朝鲜随穆德麟工作,又任袁世凯“记室”。在清末十年,“数度奉命与外国政府周旋谈判”。1904年“任赴藏钦差大臣,与英国谈判中印边界悬案”。1906年后,续任外务部右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辛亥革命期间,他与伍廷芳代表北方与南方进行“南北议和”,在“清帝逊位,改建共和”方面,“意见大致完全相同”。1912年他出任民国首任总理。后赞同护国,参与护法,追随孙中山,支持五四爱国学生。他晚年不幸遇害,使其推动共和的功绩隐而不彰。应该说,他“对中国现代化,对辛亥革命后民国缔造,是有贡献的”^{[21] 125, 146, 151 [18] P329-336}。

人是历史和文化的主体。留学教育是留学文化的支柱和起点,留学文化的特质与留学人士的素养和志气相关连。容闳倡行其“教育计划”,一直以“复兴中国”为旨归。即“藉西方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化”,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直到晚年,他还满怀深情地说,当年“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的办法”^{[9] 124, 39}。事实上,容闳一生“志在维新中国”。他在置身洋务运动期间,均以“国土”自重,在从事“购办机器”、倡行“教育计划”、“经理留学事务所”、作“秘鲁华工之调查”等洋务活动中,竭尽“报国”之诚。1883年夏后在美卜居期间,尽管“教育计划”夭折和家庭又遭妻丧的不幸,但他仍时刻不忘报效祖国。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愤“日人”“借此兴戎”,“爱国心油然而生”,遂奉张之洞电召“立归中国”,探寻“再作一番事业”的救国道路。在经过一再周折后,他收起长期以来寄希望于“洋务”的“救助中国之心”,跟随维新变法历史新潮前行。迨戊戌维新失败,他“出北京,赴上海,托迹租界中”^{[6] 146-149, 156}。1900年7月下旬,他参加在上海愚园召开的“中国国会”,被选为会长。他在起草的英文宣言中明确宣布,“变旧中国为新中国,我辈之责任也,我辈宜亟谋皇帝复辟,而创立宪之帝国”^{[24] P480}。1902年6月,他被迫逃亡返美后,与时偕行,于1908年后,把自己的“复兴中国”的理想与共和革命完全联系起来。他至诚地“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山

河和伟大的历史”^{[9] 173}。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称赞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向孙中山“致以衷心的庆贺”,强调“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25] 1326}。虽然1912年民国成立不久他就去世,但他的两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儿子(长子容颢彤,次子容颢槐)后来“均回到中国,并同娶华妇。容颢彤于1934年在北京去世。容颢槐后来定居上海,为著名工程师”^{[6] 137, 54}。由上可见,在容闳的生平思想和业绩中,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怀,他一生坚贞不渝地为“复兴中国”奋斗。他逝世后,美国康州《哈城日报》称评他为“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6] 13}。

应该认为,新中国运动实际上就是追求中国独立和现代化的历史运动。终生憧憬“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改良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容闳,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而曾被称为“容闳的‘美国人’”的留美幼童们,他们回国后,努力“介绍西方科技到中国”,“默默地工作”,“脱颖而出”,不少人曾“位居领导地位”,也堪称为“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先驱者”^{[21] P143}。显然,容闳和他的学生们的上述历史作为,也实是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所具民族性的人格化的表现。

余论:把握历史机遇,建设和谐社会

综上所述,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与整合的重要内涵和必要动力。自容闳开创中国留学教育以来,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生长虽经历留美、留欧、留日等几股潮流,但总体上都表现出开放性和民族性兼具的特色,对推动近代中国历史与文化进步,推动晚清社会沿着洋务——维新——共和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时之义大矣”。从1912年中国留学教育开创者容闳逝世的近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这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实现了共和肇建、人民解放和走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三大历史变革。而一百年来,中国留学教育,也与时偕行,多姿多彩的留英美、留苏俄、留法欧和留学其他各国的留学潮流和留学文化,对实现20世纪中国的三大历史变革,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20世纪的世界历史,也经历了“战争与革命”、“冷战”和“冷战后”的巨大变化。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当今中国,已走出了长期的历史动荡,正在“渐进”的形式下倾全力建设全

面小康的和谐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正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并逐步融入世界。中国已有一百多万学生到世界各国留学,他们正在构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新型文化桥梁。这些中国留学生,在2008年3、4月以来的“爱中国,迎奥运”的潮流中所表现出的文明、正义和理性,令世

人瞩目,令国人感动,显现出他们是容闳所开创的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的优良传统的继承者。人是历史和文化的主体。蕴涵着经济全球化时代气息、又继承中华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当代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必能在建设中国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铸立历史功勋!

[参 考 文 献]

- [1] 姚莹. 覆光律原书 [Q]. 中国史学会. 鸦片战争 (四).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2] 魏源. 武事余记·掌故考证 [M] // 圣武记: 卷 12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3] 软尘私议 [G]. 中国史学会. 鸦片战争 (五).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4] 左宗棠. 重刻海国图志叙 [Q]. 左文襄公文集: 卷一.
- [5] 曾国藩、奕訢、李鸿章等奏 [Q].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 (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6] 容闳. 西学东渐记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7] 容尚谦. 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 [M]. 王敏若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 4
- [8] 陈兰彬折、奕訢等奏 [Q].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 (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9] 李喜所. 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 [10] 郑登云. 中国近代教育史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11] 汤志钧. 康有为政论集 (上册) [G].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2] 张文襄公全集 [Q]. 北京: 中国书店, 1990
- [13] 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唐才常集 [G].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4] 戴学稷, 徐如. 容闳首创的不朽事业的继续 [M] // 珠海容闳与

- 留美幼童研究会. 容闳与科教兴国.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
- [15] 顾燮光. 译书经眼录 [M] // 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二编). 上海: 群联出版社, 1954.
- [16]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17] 刘圣宜, 宋德华. 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18] 王远明. 风起伶仃洋 (香山人物谱)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 [19] 刘学照. 容闳“复兴中国”思想和活动略议 [M] // 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 容闳与科教兴国.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
- [20] 李鸿章奏 [Q].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 (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21] [美] 勒法吉. 中国幼童留美史 [M]. 高宗鲁译注.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
- [22] 周棉. 中国留学生大辞典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23] 珠海档案馆, 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珠海历史回眸 [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
- [24] 汤志钧.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 (增订本上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5]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 [G].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Culture of Studying Abroad from Rong Hong and Zhuhai

LIU Xue-qiao

(Research Centre of Student Abroad and Modern China, Xuhou Normal University, Xuhou 221009, China)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Key Words: Rong Hong; Zhuhai; China's culture of studying abroad

Abstract: Modern China's overseas education was started by the first group of children studying in America proposed by Rong Hong. As the main birthplace of China's overseas education, Rong Hong's hometown Zhuhai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e of studying abroad. Because modern China was invaded by foreign powers frequently, there always were the historical demands of Chinese nations revival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of modern China's culture while facing the world and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s the important content and outstanding indication, modern China's education and culture of studying abroad had both characteristics of opening and nationality. Rong Hong and the children studying in America contributed to bringing western knowledge, introducing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pursuing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 revival after they return to China. It did appear the personalization of above-mentioned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周 棉]